

战火中的

中国

下

我同蒋在武汉的会晤仅半小时，在同我交谈中，蒋一直正襟危坐，回答问题简短、迅速，而且很有礼貌，给人的印象是不知疲倦，脑子总是那样清醒。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是他面部最引人注目、它们既显示出他的智慧，又掩饰着他的个性。从他眼睛里看不出他的真实思想，从他嘴里也听不到一句心里话。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英) F. 厄特利◎著
唐亮 钟旭辉等◎译

济南出版社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英) F. 厄特利 著
唐亮 钟旭辉等 译

战火中的



下



//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火中的中国. 卷 2/ (英) 厄特特著; 唐亮等译.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6. 1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ISBN 7-80710-339-6

I. 战... II. ①厄... ②唐... III. 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680 号

责任编辑 张伟卿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250001)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

字 数 1248 千

定 价 298.00 元 (共 10 卷) (平装)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目 录

第四节 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战区 (175)



罗伯逊向我描述的难民境况极为悲惨：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既没有一滴水可喝，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只能呆在酷热且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由于害怕日本飞机经常不断的机枪扫射，许多孩子在惊恐中死去；母亲因精疲力竭或恐慌而没有奶水。

第五章 重访扬子江前线 (188)

第一节 前线路路上 (188)



庙院里躺着 200 个伤员，有的睡着了，有的凝望着天。卢医生穿着将军制服，左轮枪挂在子弹带上，他迈过地上的身体，打开手电筒为另一些伤员检查。这些人瘦弱的身体和深陷的眼窝仿佛在诉说，他们是怎样在缺少甚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至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挣扎着从前线下来，来到这个至少能平静地躺着并让人喂食的地方，等待着被军用卡车或舢板送到武昌。

第二节 汤恩伯司令部 (205)



汤恩伯将军把天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在肌肉健壮的胳膊上，显得愉快开朗。他在那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司令部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现在才知道，在中国，一个将领的级别越高，就越少讲究。一个穿长袖衬衫，或有时只穿一件背心的人，可能是个非常高级的参谋官，而低级别的普通人则穿正规的制服。

第六章 沦陷前的汉口 (226)

第一节 与各国记者在一起 (226)



玫瑰餐厅是一位嫁给葡萄牙人的妩媚动人的中国太太开的。在玫瑰餐厅极少发现有中国军官和战时工作人员出入，见到的那些中国男女只不过是一些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他们可能会在城门口与日本人跳舞；在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后，极可能还会与日本人狼狈为奸。

目 录

第二节 空袭下的武汉 (237)



日本人曾一度全力要炸毁整个武昌，特别希望炸中蒋介石和他夫人居住的房子。有好几次，蒋介石和他的

夫人才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一两天，那个地方就被炸毁。8月初的一次空袭使他们夫妻险些遇害。当时，炮弹炸塌了他们防空洞的一堵墙，他们夫妻得以双双脱险全凭奇迹。他们侥幸脱险的消息没有公开，日本人也一直不知道自己差点将中国的最高领袖炸死的消息。

第三节 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西方人 (255)



一个目睹过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战士的重要见证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伊文思·卡尔森。他8月份才从中国的西北地区来到汉口。他曾与八路军、

游击队一起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行程约2000英里，横跨5个省份。一路上，他一直和八路军、游击队同吃同住，吃着粗糙难咽的小米。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第四节 我的中国熟人 (270)



李宗仁将军说：“主和派是一些害怕战争的后果发生的人。可是，这些人是极少数，他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大众的意愿。这些人从来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最高统帅、全体军人以及人民大众已经下定决心，不把最后一个日本兵从自己的领土上赶出去，就决不罢休！”

第七章 中国的政局 (280)

第一节 中国政局与蒋介石 (280)



我同蒋在武汉的会晤仅半小时，在同我交谈中，蒋一直正襟危坐，回答问题简短、迅速，而且很有礼貌，给人的印象是不知疲倦，脑子总是那样清醒。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是他面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们既显示出他的智慧，又掩饰着他的个性。从他眼睛里看不出他的真实思想，从他嘴里也听不到一句心里话。

第二节 “西安事变”与共产党 (298)



周恩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主张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委员长大概已经认

目 录

识到共产党能够动员人民，而他的部下却做不到这点。然而，蒋介石却不敢放手让共产党这样干，不然他们的力量 and 影响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

第八章 中国会灭亡吗？ (311)

第一节 动员民众 (311)



提出“动员群众”口号的不仅是中国的左翼集团，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同样赞成这一口号，并在他们所在的广西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政府

机构改革。我在汉口同李宗仁将军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我问他为什么广西人不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把改革推向其他省，听了我的问话，他笑了起来。他的翻译兼外交政策顾问康先生对我说，同共产党合作会毁掉所有的人。“你根本就没法儿同他们一起逛大街。”他半开玩笑地说。

第二节 正规战 (323)



蒋一边打日本，一边用心提防着来自国内左派力量和右翼势力对他个人的威胁。时至今日，蒋介石在反动势力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威胁中继续坚持抗日。日本不止一次地梦想国民党政府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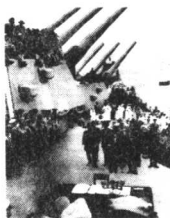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投降，如果日本认为只要缩小战争目标，就可以求得和平，那它就大错特错了。蒋介石可能比日本人想象的更伟大。

第九章 日本的战争目的 (334)

第一节 日本的大目标 (334)



日本1937年7月发动侵华战争，是由于中国当时正逐步走向统一、走向改革。过去，日本一直指望中国的内战无休无止地打下去，从而削弱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派力量，使它们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旨在阻止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点在日本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

第二节 日本的小目标 (340)



如果日本不能实现它征服中国、建立“亲日政权”的大目标，它也会像上海的一位有识之士说的那样，努力实现它制造“东亚混乱”的小目标。如果日本实现了侵华的大目标，它就会把中国变成发展它的军事工业的巨大原料库，变成它进一步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的根据地。

第四节 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战区



罗伯逊向我描述的难民境况极为悲惨：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既没有一滴水可喝，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只能呆在酷热且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由于害怕日本飞机经常不断的机枪扫射，许多孩子在惊恐中死去；母亲因精疲力竭或恐慌而没有奶水。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国际红十字会当局在中国采取的立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尚未被人普遍理解，同时又是汉口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这场战争中，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发动了一场反国际红十字会当局的活动，并争取了曾到中国前线访问过的所有人。也许，她在谴责国际红十字会当局在中国仅仅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时，太过火了一点，夸大了它的缺点和阴暗面；但是，在我们看来，她关于国外征集的资金应用于帮助中国赢得战争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

在美国和英国征集的中国救济基金无论是由国际红十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字会管理，还是由伦敦市长基金会英方代表管理，或者由美国基金会代表管理，都被用来建立和维持难民营，或资助教会医院，主要医治在空袭中受害的平民和病人。国际红十字会和教会医院所从事的工作当然是基本的人道主义工作。即使将国外征集的全部资金用于难民和受伤的平民，也不足以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不认为，为中国而战的伤兵应得到更多的援助，他们应首先享用外国征集的物资和资金，而非分文不取。事情很清楚，倘若想帮助中国获胜，那就应最先而非最后帮助中国的士兵。当人们认识到外国资金主要用于日占区的中国难民，只是一种人道主义做法，而非帮助中国进行战争时，上述问题就更明显了。假若有足够的资金救助中国的所有挨饿者和受伤者，那么资助敌战区的难民营和教会医院也将是一件好事。然而，事实却是成千上万的其他难民死于饥饿，或者向西流亡，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员死于药品的匮乏、运送不及时以及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治。

我清楚地记得，国联驻华中的防治流行病专员罗伯逊医生在我面前流露的义愤。他说，他无法为经过湖南省向西流亡的众多难民争取到资金，为他们建立避难所，提供基本的卫生设备和医疗服务。罗伯逊向我描述的难民境况极为悲惨：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既没有一滴水可喝，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只能呆在酷热且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由于害怕日本飞机经常不断的机枪扫射，许多孩子在惊恐

ZHANGHUOZHONGGUO (XIAJUAN)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地医疗服务

中死去；母亲因精疲力竭或恐慌而没有奶水。然而，就当我在长沙见到他的时候，汉口的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却决定拨款2万英磅，待日本人占领汉口时建立一个难民中心。

国际红十字会当局尽管被迫为伤员提供资金和物资，但它采取的立场是：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应在中国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因此，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它以任何公开或直接的方式支持中国。此外，它既没有人员也没有机构可以用来组织流动的医疗救护队——而这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成员私下认为，中国战地医疗服务机构太腐败无能，因此就是给它医疗物资和钱也没有什么用，它也不可能与它进行合作。尽管没有人否认这一批评有许多合理的地方，但人们还是很难接受它的观点，即由此可以让伤员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去。正如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说的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战地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和医院负责人的腐败无能，便可以对伤员撒手不管。我知道年轻诚实的医生需要用药品去医治伤员。只要让我从你们的仓库里取一些药品，我就保证它们将用到伤员的身上！”

李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与丑闻全然无关。无论是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大使对他和他的机构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以至帮助他第一次取得了伦敦市长基金的拨款。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驻汉口领事从美国的救济基金中也为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他谋取了一次拨款，这笔钱能使他的长沙医务人员培训学校维持数月。李姆医生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38年夏，在接到这些拨款前，他从西方接到的唯一财政资助竟来自德国的红十字会。

公正地说，教会医院也曾接纳过一定数量的重伤员。不过，战地医疗服务机构很少向那里送伤员。首先，这一阶段的战斗不同于原先在上海所进行的，几乎没有一个教会医院位于主要的交通线上，而战地医疗服务机构的官员每天都要处理成千名伤员。结果，他们既没有机构去为伤员分类，也没有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将20名至40名伤员送至教会医院——通常，每个教会医院只能提供这么多床位。

其次，教会医院和部队医院的医疗条件相距太远，绝大多数伤员和极少部分伤员各自得到的治疗极不一样。就是到了健康恢复期，士兵也不愿离开教会医院，即使这里花在每个伤员身上的费用远低于每个病人的平均数，但仍高于部队医院。对中国士兵来说，教会医院绝对是一个天堂。舒适的床，干净的床单，良好的护理，富有营养的食物——与典型的部队医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可以描述成四周是墙壁，伤员躺在里面，一天只有两顿很差的伙食，要么慢慢地死去，要么慢慢地康复。这一切都会引起士兵的嫉妒和与院方的冲突，以至部队不愿充分利用教会医院提供的为数不多的病床。汉口失守前，教会医院只能提供3000张床位。相比之下，军队医院却要容纳22万张。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地医疗服务

前者具备一个医院应有的一切，并得益于西方人所有的慷慨捐赠。后者却缺少一个医院应有的一切，也不能从外国得到任何帮助。无论如何，对比太鲜明了。尤其糟糕的是，平民的医疗比士兵得到的要好得多。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我有一个印象——虽然这一印象可能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主教教会医院在接纳病人治疗方面，比其他的教会医院气量更大。他们将医院向所有人开放。在南昌，我访问了一个法国人开的医院，那里的病人中，平民和士兵一样多。医院中有7个姐妹，大多已年老。尽管日机连续不断地轰炸，她们依旧留在城里。医院中有些法国人，还有一位墨西哥人，其他的则是中国天主教徒。这里与美国在南昌的教会医院不同，没有一个中国护士跑掉。

医院已是人满为患——走廊、回廊、阳台到处都是伤员。姐妹们解释道：军官付给她们的钱可以用来接收负伤的普通士兵，而后者既然不能从军方那里取得分文，所以也就对医院分文不交。这样，医院就把有钱的军官安排在最好的病房里。她们有一位出色的信天主教的中国外科医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部队医院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这里做手术，手术后又立即换下一个人。在这个医院中，有的病房住满了负伤的孩子和婴儿，有的住着成年平民，还有的是疟疾和痢疾病患者。除此以外，医院没有一个门诊部。七姐妹之一——一位已有72岁高龄的老妇人，整天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在城外的难民营医治生病的难民。

当我询问这些了不起的妇女，我能否为她们做些什么时，她们答道：“请汉口的法国领事为我们送奎宁来，越多越好。再打听一下我们在九江的姐妹们的消息。我们对她们的命运极为忧虑。自从日本人占领该城以来，我们医院中那些可怜的人们出了什么事吗？”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曾发动了关于国际红十字会政策的争论。1938年初，当她从中国西北地区到达汉口时，碰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国际红十字会拒绝她关于给八路军医药物品的要求。后来，她从中国红十字会那里得到了一些；最后，还使国际红十字会送一些药品给布朗医生。史沫特莱和香港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一起发动了这场抗议国际红十字会当局的运动，他们指责后者的仓库里堆满了药品，却拒绝给部队使用。汉口的绝大多数报社记者都站在她的一边。她还争取到毕晓普·鲁特、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格先生、美国领事乔斯林等人的支持。一些年轻的传教士也拥护她的立场。

总之，正是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使得每一个人关切伤员所处的悲惨境遇，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她和支持者一起不断地在国外发表文章呼吁，才使在长沙英勇工作的医生慢慢得到了援助。

保卫中国大同盟秘书塞尔温·克拉克太太曾亲自视察了中国的军队医院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争取到了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地医疗服务

香港的毕晓普和其他人的支持。塔尔博特医生在香港、上海和美国的代表又进一步澄清了立场。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终于对国际红十字会当局及分配英美救济金的那些人的态度产生了影响。虽然他们仍认为不能直接援助中国的军队，但在1939年初，他们向李姆医生总部所在地的江西拨款1万英镑，用来从事医疗救济工作，并答应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给李的两个医疗队购买药物和卡车；他们还将买1万英镑的医疗用品送给部队医院，唯一的条件是，这些物资必须经过香港的毕晓普之手并配一名欧洲医生与李姆一起在江西工作。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我们其他人激起了国际红十字会当局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新生活运动基督教徒领导人的愤怒。无疑，我们有点草率，立场也欠灵活。但是，伤员的惨遇，在部队医院目睹的一切，对我们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以至对形势的看法不那么冷静、客观和公正。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有时夸大事实，未等证据确凿便大加指责。但是，假若没有她最初的推动，没有她掀起的风暴，难以容忍的局面就永远也无法改变。

史沫特莱对任何人一律看待。在与国际红十字会当局斗争的同时，她还努力使中国人自己正视伤员问题。即使在政治上是左倾的青年组织，假若他们满足于谈论“动员民众”和“保卫武汉”，而自己不站出来身体力行，史沫特莱也会变得很不耐烦。征集资金用于维持长沙医务人员培



战火中的中国（下卷）

训学校，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机构，购买卡车和医疗用品，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样至关重要的：动员自愿人员去学校受训，然后从事麻烦而又危险的工作。

一天晚上，在汉口我的房间里，召开了一个由各青年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主题是“保卫武汉”。在这群受过教育的青年中，我和史沫特莱发了言，并真诚地为红十字会的志愿人员辩解。在我们看来，倘若要保卫武汉，医治伤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就在我们讲完后，这些诚挚的爱国青年男女就说道：“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今晚会议的主题：保卫武汉。”显然，他们并不以为照料伤员有多么重要。在他们看来，动员人民，保卫首都，是一个比护理或急救伤员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将通过自己的爱国主义演讲使农民武装起来，激发他们为国捐躯——而非擦洗地板，料理伤员和努力工作。

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有一种特别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有文化的青年并不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太戏剧化了。李姆医生有一次问我，是否看过中国的戏剧，假若看过的话，就可以理解以传统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激情和行为。

“中国的年轻人，”他说道，“将为他们的国家献身——倘若这种牺牲以戏剧性或传统的形式做出的话。然而，倘若牺牲是平凡而又不引人注目的，非戏剧般的，那么他们就很难做出。假若向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保证，他们的牺牲